帝國夾縫中的香港

華人精英與英國殖民者

高馬可（John M. Carroll）著
林立偉 譯

HKU PRESS
香港大學出版社

Edge of Empires: Chinese Elites and British Colonials in Hong Kong
by John M. Carroll

Copyright © 2005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1
by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香港大學出版社
香港薄扶林道香港大學
https://hkupress.hku.hk

© 2021 香港大學出版社

ISBN 978-988-8528-63-9（平裝）

版權所有。未經香港大學出版社書面許可，不得以任何（電子或機械）方式，
包括影印、錄製或通過信息存儲或檢索系統，複製或轉載本書任何部分。

10 9 8 7 6 5 4 3 2 1

百樂門印刷有限公司承印

目 錄

鳴 謝 vi

緒 論 1

第一章　殖民統治與合謀協作：華人子民與英屬香港的形成 16

第二章　更優秀的華人階級：建立東方商業重鎮 36

第三章　勢力平衡：殖民處境中的地位與尊重 56

第四章　屬於自己的地方：會所和協會 80

第五章　民族主義與身份認同：何啟的例子 102

第六章　保全香港：1925 至 1926 年省港大罷工 122

第七章　滄海桑田：1941 開埠百周年 144

結 論 163

參考書目 173

緒 論

和許多到訪英國殖民地香港的人一樣，法國人馬克•沙杜納（Marc Chadourne）覺得香港是個引人入勝的地方，既不像中國，又不像亞洲其他地方。沙杜納在1930年代初抵達香港的海港，覺得這個殖民地難以歸類，並為之著迷：「我開始認出這一切。這裡是中國——飢民的嚎叫，香料的顏色，衣衫襤褸者發出令人掩鼻的味道，它的傲慢無禮，貪婪無厭……但這個城市，從原本濁臭的氣氛中慢慢昇華蛻變；它櫛比鱗次的建築、華廈、平房，堆積成一片層層相疊的半圓形地帶，恍如海市蜃樓，令人歎為觀止；它沿山而建的花園、蜿蜒的道路、空中樓閣、風雨欲來的天空映襯出兩座山峰，形成節節攀高的景觀——這不是中國。這是一座英國城市。這是香港。」[1] 沙杜納乘坐計程車穿行於中環這個香港主要商業區的狹窄街道，兩旁商店林立，來到香港和中國的首家華資百貨公司——先施公司。他疑惑地問道：「這是不同的一群人、不同的民族麼？頭戴瓜皮帽、身穿藏青長袍的紳士不見蹤影，穿著白色小褲子的家庭主婦不見蹤影。這裡全是朝氣煥發的中國人、亞洲人，一身裝扮與巴黎『美麗花園』（Belle Jardinière）百貨公司所見的毫無二致。」[2]

以英國皇室成員和殖民地官員命名的街道秩序井然，旁邊是許多歐籍人不敢踏足的華人街市，裡面熱鬧喧囂；由歐籍醫生管理的殖民地醫院與售賣各式傳統藥材的中藥行為鄰；這種不搭調的事物並存的景象，總教西方訪客驚訝不已。瑪麗•特恩布爾（Mary Turnbull）說：「香港這個中國人的『馨香之港』，總是散發令西方人為之沉醉的吸引力，這裡是帝國的前哨，是被幅員

1. Marc Chadourne, *China*, trans. Harry Block (New York: Covici Friede, 1932), pp. 25–26.
2. Ibid., p. 36.

廣袤的中國包圍的細小飛地，是生機勃勃、充滿新奇經歷的異國轉口港；而矛盾的是，這個一切正常的彈丸之地，是處於一個令人望而生畏的大陸的邊陲……對於那些抵擋不住香港的誘惑的人來說，這裡或許是危險之地，但這個殖民地代表秩序和安全，與動盪不安的內陸腹地恰成對比，在當時大部分英國人眼中，內陸是殘暴悽苦的黑暗大陸，那裡的腐敗官員以野蠻酷刑處罰民眾，還有異教徒溺殺初生女嬰。」[3]

本地居民，不論華洋，可能也因這種東西方的奇特結合而感到迷醉。1948年，記者蘇福祥形容香港的特徵是「中西合璧」。不過他也說，香港雖是中西文化交會之地，但統治階級仍是英國人，而子民是華人，由於這種不平等，中西文化不能合流而產生一種新的香港文化。蘇福祥在另一篇文章認為，經過一百年英國殖民統治，香港華人仍然不能恰如其分地稱為香港公民，因為他們沒有政治代表權。儘管這個殖民地的立法局、行政局和市政衛生局有華人擔任議員，但他們是由港督委任，非由公民選出。[4]

歷史上的香港

我在此書會剖析香港一些矛盾和不協調的情況，而我是把香港看作兩個大帝國政治和文化遭遇之地來加以探討的。這兩個大帝國，一個是日薄崦嵫的中華帝國，另一個是如日方中的大英帝國。我的側重點是英國殖民統治精英和華人資產階級領袖之間的關係。鴉片戰爭（1839至1842年）後的一百年，上層華人與英國統治者合謀協作，建設這些華人認為屬於他們的地方。這種合作並非受殖民管治的結果，而是來自新興華人資產階級的自發和努力。殖民統治的反復無常、漠視和往往無能，為華人資產階級領袖開闢了一些空間，令他們可以施展於其中，而這些空間又受一個因素所塑造，那就是香港處於中華帝國和大英帝國的邊緣，佔據重要的地理、政治和文化位置。殖民地政府與這些華人精英的關係既非支配，也不是抵抗，而是彼此志同道合，偶爾發生利益衝突。華人精英和英國殖民者一致渴望把香港建設為成功和穩定的商業樞紐，但兩個社群設有各自的會所和協會，在生活上彼此大多不相往來。所以，他們在經濟和政治上合作之餘，又同時實行社會隔離制度。

3. C. Mary Turnbull, "Hong Kong: Fragrant Harbour, City of Sin and Death," in *Asia in Western Fiction*, ed. Robin W. Winks and James R. Rush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pp. 117–118.
4. 蘇福祥：〈「中西合璧」的香港文化〉，載黎晉偉主編：《香港百年史》（香港：南中編譯出版社，1948），頁168–169；蘇福祥：〈漫談「香港人」〉，載黎晉偉：《香港百年史》，頁133。

中國史家多半專注於中國「本土」，而研究英國殖民主義的學者，通常會把焦點放在非洲和印度，直至最近，香港史學都一直主要囿限在兩個研究取向。英國人的歷史書寫往往是一些聖徒傳式著作，強調英國總督和公務員的作用，而完全忽略華人。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採取另一種研究取向，但同樣無助於我們深入了解這個殖民地的華人。這種研究取向往往貶抑華商，例如把他們視為只是英帝國主義者的「走狗」。在這些學者眼中，香港的重要性僅在於它是被英帝國主義者攫奪之地，並且是西方帝國主義者的侵華基地。[5]

但是，過去十五年，學者建構出更細緻豐富的香港史。冼玉儀和陳偉群以社會學家萊思布里奇（Henry Lethbridge）和神學家兼史家施其樂（Carl Smith）的先驅之作為基礎，指出華商精英如何獲取社會和政治聲望，保護受外來政權統治的華人利益，並成立諸如東華醫院和保良局等組織，充當華人社會的代表。[6] 有一種普遍觀念認為，香港華人是殖民地政權的冷漠順民，但蔡榮芳駁斥這種觀念，指出華人勞工階級民眾有敵視殖民統治的悠久傳統。霍啓昌的著作強調香港華人對近代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貢獻。陳劉潔貞顯示香港如何受到二十世紀初中國紛亂的局勢影響。鍾寶賢認為民國初年的政治動盪，促使香港華商投資於廣州政治，以保障自己的商業利益。文基賢（Christopher Munn）近期的研究揭露，香港開埠初期，殖民地政府曾想將香港改造為夢寐以求的「英治華夏」（Anglo-China），令中西商人能在英國自由主義和公正司法下昌盛發展，但該嘗試以失敗告終。[7]

---

5. 英國歷史撰述的例子，見 G. B. Endacott, *A History of Hong Kong*, rev. ed.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和 *Government and People in Hong Kong, 1841–1962: A Constitutional Histor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4)，Geoffrey R. Sayer, *Hong Kong: Birth, Adolescence, and Coming of Age, 1841–1862*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7) 和 *Hong Kong 1862–1919: Years of Discre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5)；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取向的例子，見丁又：《香港初期史話，1841–1907》（北京：三聯書店，1983）。
6. Chan Wai Kwan,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Society: Three Studies of Class Formation in Early Hong Kong* (Oxford: Clarendon, 1991) and Elizabeth Sinn, *Power and Charity: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Tung Wah Hospital,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7. Jung-fang Tsai, *Hong Kong in Chinese History: Community and Social Unrest in the British Colony, 1842–1913*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與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K. C. Fok, *Lectures on Hong Kong History: Hong Kong's Rol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Hong Kong: Commercial Press, 1990) 和霍啓昌：《香港與近代中國》（台北：商務印書館，1993）；Chan Lau Kit-ching, *China, Britain and Hong Kong, 1895–1945*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0)；Stephanie Po-yin Chung, *Chinese Business Groups in Hong Kong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 China, 1900–25* (Basingstoke, UK: Macmillan, 1998)；以及 Christopher Munn, *Anglo-China: Chinese People and British Rule in Hong Kong, 1841–1880* (Richmond, UK: Curzon, 2001)。

這些著作的要旨是探討香港華人如何適應殖民統治，怎樣在外來並且往往高壓的殖民地政權下求存。我同意殖民統治有許多不是之處，但我在此書中認為，至少對華人資產階級而言，殖民時代的香港並非是那麼水火不容或令人不知所措的地方。華人商界精英的出現，是與香港的殖民地性質密不可分。此外，對於決定英國統治的形態，以及限制其涵蓋範圍，華人的參與作用十分重大。處於中華帝國和大英帝國夾縫中的香港，其特質就是既同心同德，又扞格齟齬。這個組合為華裔商人提供了機會，令他們得以成為有組織和自覺的商界精英。廣州、漢口和上海等中國城市的商人肯定也有類似機會，[8] 但是，殖民地政府堅信，香港在大英帝國中的歷史作用應該是擔當商業中心，因此，能夠協助香港達成和維持這種歷史理想的華商就獲政府青睞，得以脱穎而出。到了十九世紀末，在港府眼中，此殖民地的華商已不再是為逐利而來的過客，而是一同努力造就香港、華南乃至大英帝國安定太平的盟友。

與傳統觀點相反，我研究香港是從香港本身的文化歷史地位著眼。雖然形容香港的陳詞濫調多不勝數，例如説它是東西文化交會點，在中國近代史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一如台灣，香港往往被人當成用來了解另外一些事物的鏡頭——最常見的是1949年共產主義革命前存在的「傳統」中國農村社會。如果有人對香港下定義的話，那往往是局限於它的一些不光采特質：暮氣沉沉的殖民地，1949年前一直被猶如半殖民地的上海壓倒，顯得黯然失色；缺乏文化和歷史的資本家天堂，金錢以外的事物全都無關重要；以務實和冷漠為唯一政治原則的地方；並且是暫時寄跡的過客和難民的天堂。即使膾炙人口的「香港成功故事」，也是憑藉香港一些不堪回首的特點：1830年代末英國人到來前，香港只是「不毛荒島」；1949年共產主義革命前上海企業家大舉南來，香港不過是殖民轉口港，無本土工業可言——而「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這個眾所熟知的説法，背後所根據的假設是：香港沒有真正屬於自己的時間或地方。[9]

同樣一反傳統見解，我在此書中主張，早在1949年前，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個殖民地與中國大陸隔離之前，本地華人資產階級已發展出本

8. Marie-Claire Bergère, *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1911–193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William T. Rowe,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and *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and Mark Elvin and G. William Skinner, eds.,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9. Richard Hughes, *Hong Kong: 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 (London: André Deutsch, 1968).

土身份認同感。人們普遍不願承認香港身份認同早在1949年前已出現，一個密切相關的原因是不願把香港視為具有自己地位的地方。這部分是出於政治原因。香港主權最近回歸中國，現在的側重點通常放在香港的「中國特質」(Chineseness)。另一個原因是香港人常常來去不定。許多來港的外僑和難民，不管他們最後實際逗留多久，都只視此處為暫時棲身之地。因此，阿巴斯（Ackbar Abbas）觀察到，香港給人的感覺似乎「與其說是落腳的地方，不如說是中轉過渡的空間」。[10] 這種普遍假設認為，像香港這種著重商業的地方，無法培養居民太大的認同感，但就忽略了一點，那就是香港華人資產階級熱中於賺錢，是他們凝聚成有自我意識的群體的原因之一。最後，最近人們強調當代香港身份的流動游移，不受疆界限制，並擁有多重層次，往往貶低了這種身份中歷史性和本土化的香港根源。

如同我在這本著作所顯示，早在十九世紀末葉，香港華商領袖就協助把香港建設成具有本身地位的地方。這個地方的意義隨時代嬗遞而不同，但有三個主題仍是一貫的：香港對於中國國家建設的作用；香港在大英帝國中的位置；以及殖民地官方版的香港史。這些人積極利用香港的關鍵地位來凸顯自己是特殊的華人群體，有別於中國大陸的中國人。他們在中國國家建設的作用，既表明他們致力為中國出力，又顯示自己的獨特性。他們將香港的發展和進步與中國相對照，藉以凸顯這種獨特性。他們捐款贊助大英帝國的戰爭資金、為訪港皇室人員組織慶典、參加帝國貿易展覽，藉著這類活動令香港成為版圖遍及全球的大英帝國的活躍成員。他們和殖民地官方版的香港史一樣，把香港的「真正」歷史由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之日算起，從而把自己聯繫到這段歷史中。他們將這個殖民地的商業成就大書特書，以強調自己在此過程中的作用。因此很弔詭地，香港能自成一具有本身地位的地方，塑造這種性質的因素卻在於它是人和貨物流動的空間、它與華南的關係，以及它在大英帝國中的位置。

香港與殖民主義

儘管許多學者強調這個前殖民地的中國特質，自1997年香港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後尤其如此，但我在此書會把香港放到中國歷史和英國殖民史的框架之中。有超過一百五十年時間，香港可說是中國最重要的地

10. Ackbar Abbas, *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p. 4.

方，但它能夠成為如此重要的地方，卻是因為它在這些歲月裡，大部分時間在政治上不屬於中國一部分。1911年，領導革命推翻中國最後一個王朝的孫中山，是在殖民地香港受教育。中國現代法律之父伍叙（伍秩庸，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多稱他為伍廷芳）也是在香港成長和受教育，他返回中國之前，曾在殖民地政府服務。香港是百貨公司、保險業和現代銀行業等中國商業制度的發源地，它們後來有助廣州和上海等城市的轉型。直至最近幾十年，大多數華人移民出洋，都是從香港出發；而北美或東南亞華僑返回中國，幾乎一定都取道香港。同樣地，海外華人的僑匯全經香港匯回中國。

此外，大多數關於香港的學術研究都淡化殖民統治元素。例如，這個殖民地政治非常穩定，人們對此經常提出的解釋是：香港的現實不符合典型的殖民統治模式。一個研究認為，大部分殖民主義理論往往強調政府的壓迫力量或種族「隔離」的重要性，這兩點都不大符合香港的情況。因為英國人佔領香港是為貿易，而非領土控制，因此英國攫取香港，不能用宗主國榨取資源來解釋。另一個研究正確地指出，英國人在香港「無意也不曾認真嘗試在他們所征服的領土上推廣英國文明，以變化其帝國臣民的氣質，成為黃皮膚、棕皮膚或黑皮膚的英國人」。[11]

以上這些解釋都過於淡化殖民統治對於香港歷史發展的作用。如同帕爾塔 • 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所說：「實行殖民統治其實並非真的為了殖民統治，而是為了另外的目的，這種說法在殖民統治本身的宣傳言論中是歷久不衰的主題。」[12]「香港成為殖民地前並無歷史可言」的說法固然過甚其詞，不過，阿巴斯指出：「若以香港發展成今天面貌的意義而論，香港史根本就是殖民史。」這見解很正確。雖然香港不像其他歐洲殖民地那樣，有大規模使用暴力的情況，但是，英國從中國手上強奪香港島和與之隔海相望的九龍半島，靠的是威逼和軍力。香港缺乏天然資源，不值得為此掠奪領土，但可以利用這個領土為基地，滲透中國市場並加以壓榨。雖然殖民地政府不像其他地方的殖民政權那樣，在居住地、職業和法律地位方面嚴格實行華洋隔離，

11. Lau Siu-kai, *Utilitarianistic Familism: An Inquiry into the Basis of Political Stabilit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ocial Research Centre, 1977), pp. 21–24，以及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7–9；英國想要在香港達到的目標的引文，見 Steve Tsang, ed.,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4。
12. Partha Chatterjee, *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4.

但是，這個以和諧和「英國司法公正無私」而自豪的政府，卻容忍和鼓勵香港出現法律歧視。[13]

這些解釋極度貶抑香港的殖民性質，從而漠視此殖民地歷史和社會的一些重要層面。香港政府的「積極不干預神話」已被證實是虛妄的。這個政府利用諸如現代醫療之類的手段，作為規訓權力（disciplinary power）的工具。西班牙人統治菲律賓時積極改變當地人的信仰，英國人沒有像西班牙人那樣嘗試令華人改宗基督教，但早期的殖民官員和傳教士視自己的任務為推廣文明，這不限於在華南，還在英國本土和大英帝國全境。事實上，帝國概念的力量主要來自它宣稱能令「落後的」殖民地和「先進的」宗主國一同重新煥發活力。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大多數歐洲人認為基督教、文明和商業緊密相連，不可分割。[14]

我們不應淡化香港的殖民地性質，反而應該問：殖民統治在香港歷史中發揮了什麼作用？康納丁（David Cannadine）在其近期研究中探討了階級和地位在英帝國主義中的作用，也評述了各研究殖民主義的學派及它們的批評者。以宗主國為焦點的學者被批評為新殖民主義；那些專門探討宰制與獨立相對的人，則被指摘跌入簡單二分法和二元對立的窠臼，而且側重壓制與衝突，而非協作。後現代主義者和後殖民主義者被指摘文筆很差，對歷史的掌握很弱，並且高估了殖民統治的力量。[15]

康納丁的總結反映了對於近期殖民研究趨向的批評，如何成為了一門小小的行當。這些批評有不少是針對薩依德（Edward Said）的「東方主義」

---

13. Abbas, *Hong Kong*, p. 2.
14. 關於「不干預神話」，見 Ming K. Chan, "The Legacy of the British Administration of Hong Kong: A View from Hong Kong," *China Quarterly* 151 (September 1997): 574–575；關於「現代醫療」，見 Philippa Levine, "Modernity, Medicine, and Colonialism: The Contagious Diseases Ordinances in Hong Kong and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positions* 6.3 (Winter 1998): 675–705 及 Carol Benedict, "Framing Plague in China's Past," in *Remapping China: Fissures in Historical Terrain*, ed. Gail Hershatter et a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7–41；關於「重新煥發活力」，見 John L. Comaroff, "Images of Empire, Contests of Conscience," and Susan Thorne, "'The Conversion of Englishmen and the Conversion of the World Inseparable': Missionary Imperialism and the Language of Class in Early Industrial Britain"，兩篇文章均載於 *Tensions of Empire: Colonial Cultures in a Bourgeois World*, ed. Frederick Cooper and Ann Laura Stol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p. 163–197, 238–262，以及 John M. MacKenzie, *Propaganda and Empire: The Manipulation of British Public Opinion, 1880–1960*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2；以及 Adrian Hastings, *The Church in Africa, 1450–195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5. David Cannadine, *Ornamentalism: How the British Saw Their Empi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xvi–xvii.

（Orientalism）。東方主義認為，西方對於亞洲和中東的描繪和形象形成一種論述，這種論述所根據的基礎，是「東方」與「用以支配、重構和施加權威於東方」的方式之間「在本體論和認識論意義上的差別」。批評者認為東方主義並非連貫一致的權力體系。反之，它同樣是殖民統治者方面軟弱、恐懼和混亂的象徵。東方主義有關殖民宰制和霸權的假設，忽略了殖民統治的性質有時候是脆弱、短暫和有限的。[16]

修正論者也批評底層研究學派（Subaltern Studies Collective），這個學派主要集中研究印度，尤其是「這個民族無法自立自主的問題」。底層研究學派質疑殖民當局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史學，斥之為「精英主義」史學，但批評這個學派的人說，此學派誇大了殖民統治對於殖民社會的影響，而且沒有運用任何新的研究材料，也無法提供新的理論洞見。[17] 批評者也抱怨，即使是底層研究也不再專注於底層，而是從社會分析轉向文本分析，並從研究弱勢群體轉為批評殖民權力／知識。昌達瓦卡（Rajnarayan Chandavarkar）寫道：「到了 1980 年代末，底層研究已經捨棄了底層。」[18]

關於殖民統治最晚近的研究取向是後殖民主義，由於這派理論是受東方主義和底層研究啟發，所以也受人批評，有時候甚至受到被視為「後殖民」的理論家批評。後殖民主義也受到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和心理分析理論影響，所以很強調差異、表述和文本性的重要。一如東方主義和底層研究，後殖民主義常常認為，對殖民地來說，殖民統治是最舉足輕重的，沒有任何事

16. Edward Said, *Orientalism: Western Conceptions of the Orient* (New York: Pantheon, 1978), pp. 1, 3；薩依德的批評者，如 C. A. Bayly, *Empire and Information: Intelligence Gathering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in India, 1780–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和 John M. MacKenzie, *Orientalism: History, Theory, and the Art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以及 Sumit Sarkar, "Orientalism Revisited: Saidian Frameworks in the Writing of Modern Indian History," in *Mapping Subaltern Studies and the Postcolonial*, ed. Vinayak Chaturvedi (London: Verso, 2000), pp. 241, 249, 252。

17. Ranajit Guha, "On Some Aspects of the Historiography of Colonial India," in *Selected Subaltern Studies*, ed. Ranajit Guha and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43。關於「缺乏新的理論洞見」，如見以下著作所收錄論文：Chaturvedi, *Mapping Subaltern Studies*。貝利（C. A. Bayly）在為此書所寫的文章 "Rallying around the Subaltern" (pp. 117–118) 中認為，「底層研究的作者利用理論的方式，通常與精英歷史學家無異，是把理論用作放到腳註裡的開胃配菜，不過在這過程中，福柯（Foucault）、葛蘭西（Gramsci）和德里達（Derrida），與韋伯（Weber）、馬克思（Marx）或帕累托（Pareto）雜混在一起。」

18. 關於「轉向文本分析」，見 Sumit Sarkar, "The Decline of the Subaltern in *Subaltern Studies*," in Chaturvedi, *Mapping Subaltern Studies*, pp. 300–323；Rajnarayan Chandavarkar, "'The Making of the Working Class': E. P. Thompson and Indian History," in Chaturvedi, *Mapping Subaltern Studies*, p. 65。

物的重要性可與之相比，因此在某殖民社會的歷史上，殖民統治時代就成為其**唯一**決定性的時期。[19] 後殖民主義和底層研究一樣，主要以印度的事例為依據，印度的事例成為理解各地殖民統治的依據。王愛華說，把「後殖民」以這樣「不嚴謹的方式使用」，「產生一種荒誕效果，就是助長了西方把其他地方他者化的傳統」。安妮 • 麥克林托克（Anne McClintock）說，後殖民對於二元對比的強調，「再次令世界圍繞著殖民/後殖民這個單一的二元對立打轉」。[20]

我們需要的，不只是對於東方主義、底層研究和後殖民主義的理論批評或辯護，而是更多既印證又質疑這些研究取向的地方史。在我的香港研究中，我嘗試避免有關「殖民計劃」的宏大說法，「殖民計劃」的概念往往會掩蓋歷史和地理差異。[21] 此書不會對殖民統治做抽離歷史背景的概括，而是從約一百年的時間跨度來審視一個殖民地。我思考了殖民主義的意圖和結果後認為，有關殖民主義的歷史敘事，必須同時注意世事總是變幻莫測的。後殖民主義和東方主義一樣，更擅長於顯示殖民者的意圖，而非它們對於被殖民民族的影響。[22] 從開埠之初起，香港的殖民統治就陷入動盪不安的困境：經濟和社會問題、與廣州和北京中國政府關係不睦、英國外交部和殖民地部之間的緊張，以及邊界彼方的華南地區局勢動盪。我會在此書指出，殖民地政府無力把香港變成英國官員所憧憬的偉大「東方商業重鎮」。我還會探討英國殖民統治有哪些縫隙，留下了讓本地華人精英施展的空間。官民隔閡、政府沒有為華人子民提供足夠的醫療設施，又無力造就安全的營商環境，這些

19. Alijaz Ahmad, "The Politics of Literary Postcoloniality," in *Contemporary Postcolonial Theory*, ed. Padmini Mongia (London: Arnold, 1996), pp. 280–281; Anne McClintock, "The Angel of Progress: Pitfalls of the Term 'Post-colonialism'," in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ed. 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93; Ann Laura Stoler and Frederick Cooper, "Between Metropole and Colony: Rethinking a Research Agenda," in Cooper and Stoler, *Tensions of Empire*, p. 33.

20. Aihwa Ong,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34; McClintock, "Angel of Progress," pp. 292–294.

21. McClintock（"Angel of Progress," p. 293；著重號為原文所有）注意到「後殖民」這個詞常常是意指單一性，而非多元性和差異：諸如「**那一**後殖民狀況」、「後殖民性」和「**那一**後殖民他者」等詞彙，把歷史簡化成「單一問題」。有關東方主義和後殖民主義脫離歷史性質的其他批評，見 MacKenzie, *Orientalism*, p. 11；Dennis Porter, "*Orientalism* and Its Problems," in Williams and Chrisman, *Colonial Discourse*, p. 152；Dane Kennedy, "Imperial History and Post-Colonial,"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24.3 (September 1996): 350–351；Ania Loomba, *Colonialism/Postcolonialism* (London: Routledge, 1998), p. 17。

22. Pier M. Larson, "'Capacities and Modes of Thinking': Intellectual Engagements and Subaltern Hegemony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Malagasy Christianit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2.4 (October 1997): 1000.

皆是華商可乘之隙，他們為本地華人和政府提供服務，藉此贏取稱許。同樣地，這些商人安排慶祝活動接待來訪英國皇室人員，並捐款支持大英帝國開支和戰爭經費，有助他們從殖民地政府獲取地位。在殖民地所能見到的，不只是剝削，還有人民如何利用夾縫發跡變泰。

本書也承認從屬性（subalternity）的許多複雜情況，在香港，從屬性是建立在種族與階級之間的複雜關係之上。雖然在東方主義者和後殖民主義者眼中，殖民統治賴以建立的基礎是種族差異和「他者性」（otherness），但康納丁認為，這樣強調種族，其代價會是忽視社會結構：至少對於英國人而言，帝國主要是以階級和地位為依據。但是，為什麼殖民統治所根據的基礎，一定要麼是種族，要麼是階級，而不可以同時是兩者？賀蕭（Gail Hershatter）探討把底層研究應用於中國歷史所遇到的問題，她指出，把支配與從屬對立起來，忽略了「從屬性是有取決於關係的多種程度」，某人因情況和環境不同，有些時候處於支配地位，另一些時候則處於從屬位置。一如底層研究，後殖民主義常常將支配和從屬之間的關係簡單化。[23]

香港當然從來不是只由華人或只由英國人組成。這個殖民地跟遍佈中國沿海和內河的通商口岸，以及大英帝國版圖內大部分城市一樣，從一開始起就是多民族雜居。除了英國人和華人外，香港人口中還有歐亞混血兒（他們的人數在接近十九世紀末減少，但在商界和政壇仍然地位崇隆）、印度人（尤其是擔任警察的錫克教徒和回教徒，以及四海為家的帕西商人，帕西人〔又叫巴斯人〕曾經在商界叱吒風雲，並且樂善好施，但影響力在二十世紀初衰減）、來自澳門古老家族的葡萄牙人、猶太裔的沙遜（也譯沙宣）和嘉道理家族、其他歐洲人、亞美尼亞人和美國人。這些群體彼此的交往方式，無法以嚴格的方式來分類。

從屬性的複雜情況和多層次，在香港華人資產階級身上或許最顯而易見。這個階級的領袖從屬於英國資產階級，儘管前者往往比後者富裕，並主宰大部分香港經濟。雖然這些華人有能力在山頂這個香港最尊貴的山區購買豪華住宅，但法律禁止他們在這些房屋居住。這些華人商界精英在本地華人社會佔主導地位，即使他們的支配權在二十世紀已喪失不少；他們自認為有別於中國大陸上的中國人——甚至更為優越。不過，中國有些人認為香港精

23.「我們不應忘記，大英帝國首先是階級行為，在這種行為中，個人的社會排序，往往比集體的種族排序來得更重要。」（Cannadine, *Ornamentalism*, p. 10）；Gail Hershatter, "The Subaltern Talks Back: Reflections on Subaltern Theory and Chinese History," *positions* 1.1 (Spring 1993): 110–111。

英只汲汲於賺錢，而且因為生活在殖民地，所以不是純粹的中國人。[24] 華人被排除於香港最高管治機關（直至1926年才有華人獲委任為議政局〔後稱行政局〕議員），而且歐籍人有時候與香港的印度商人更親近，但殖民地官員很清楚，要保持這個殖民地太平安定，總得依賴這些「忠心華人」。英國官員常常強調香港華人沒有能力承擔任何有意義的政治代表權，但通常認為，相較於大英帝國許多地方的非白種子民，香港華人更為文明開化一點。此外，這些華人常自視為全球華僑社群的一員，比許多其他亞洲人富裕，文化也更優越。從1947年發表的一篇論述香港華人的文章可見，這種自覺的種族優越感並非殖民統治者獨有。此文把「性情多數懶惰，文化的程度又低」的馬來人，與「刻苦耐勞」的華人相比較，並說南洋的歐洲列強殖民地之所以興旺發達，全是靠華人的「血汗」開發，這種語調不禁令人聯想起殖民主義人類學。[25]

提倡底層研究學派的人想要克服以精英為重心的史學，這種用意固然值得欽佩，但他們往往相信有一個更加「真實」的本土人口存在，並且覺得某人的社會階級愈低，或者所受的壓迫愈大，此人就愈「真實可靠」。這樣往往就置「雜糅混合的」精英階層於不顧，因為他們被視為不是那麼真實可靠。底層研究的學者還假設反抗是殖民統治的最重要特徵。但如弗雷德里克•庫珀（Federick Cooper）寫道：「許多反抗文學的撰寫，彷彿都把抵抗視為是至關重要的。」反抗被人加以擴大，乃至於「認為從事反抗的人，沒有任何其他生活可言」。[26] 底層研究的支持者常常假設，被殖民的民族在道德上有責任反抗他們的壓迫者，並且由於這種道德義務，他們會以各種方式加以反抗。但我在此書中會指出，這種道德義務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

我還表明，香港華人也參與創造把英國在香港的統治加以頌揚和合理化的殖民論述。被東方主義、底層研究和後殖民主義單一化和簡略化的事物，不只殖民統治，往往還包括西方本身，因而催生鐵板一塊的「西方主義」，對

24. 這種態度持續見於1949年後的中國和台灣；例如，1958年台灣出版的一本研究香港華僑教育的著作說：「香港華僑社會，純粹是商業性質的社會。此地『永久居民』，多數是商人，不然就是商人的子孫。他們的主要興趣，乃是生財殖貨，發展其所經營的商業，繁榮個人或家族；至於研究學術，提高文化水準，則常無暇顧及。」馬鴻述、陳振名編著：《香港華僑教育》（台北：海外出版社，1958），頁5。

25. 何劍：〈華僑與香港建設〉，載陳大同等編：《香港華僑團體總覽》（香港：國際出版社，1947），頁7。

26. 關於「雜糅混合和真實可靠問題的論述」，見 Nicholas Thomas, *In Oceania: Visions, Artifacts, Historie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1；Frederick Cooper, "Conflict and Connection: Rethinking Colonial African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9.5 (December 1994): 1532。

本土民族如何參與創造東方主義式殖民論述視若無睹。[27] 本書揭示香港華人如何促成所謂的「香港傳奇」——奉行英國自由貿易和公正司法制度而欣欣向榮的殖民地。從1925至1926年的省港大罷工，可以看到華人資產階級如何把混亂的廣州與太平的香港作對照，並強調「忠心」永久居民與香港其餘華人之間的差異。香港華人也協助建構殖民觀點的官方香港史，這種歷史是以英國佔領為開端的。

殖民統治是以一種乖謬的觀念為根據，認為有些人種或民族是與生俱來的，甚至是由上天選派適合於統治其他民族。但是，殖民統治本身是「極其含糊不清的現象」。在不同地點、不同時間、對於不同的人有不同涵義。對許多香港華人來說，殖民統治是解放多於壓迫。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中國民生凋敝、國事蜩螗，許多華人急欲逃離，大多數華人來到香港，是因為此地有經濟機會並且政治修明，這是香港殖民地官員和華人居民同樣強調的事實。但是，重新評估殖民統治的作用，不應誤以為是想為殖民統治辯護，無論是歐洲列強還是其他國家實行的殖民統治，也不管是發生在亞洲還是其他地方的殖民統治。如同歷史人類學家尼古拉斯•托馬斯（Nicholas Thomas）寫道，重新審視殖民統治的目的，並非「要恢復建立帝國的工作，而是要了解它們過去（和現在）為何得到不同階級和利益團體支持，這種支持又有多大」。我們在檢視殖民政府和華人社會之間的關係時，須小心考慮殖民地環境提供了哪些在中國付諸闕如的選擇和不同出路。[28]

最後，也許是最重要的，強調二元對立和文化差異不可克服，這種想法忽視東西方之間可能有任何對話。殖民地不一定充滿緊張和隔閡。把殖民歷史主要視為文化衝突，掩蓋了合作和互相遷就的模式，並且假設殖民接觸一定充滿極大的陌生感、疑惑或牴觸——「人類歷史中最複雜和創痛的關係」。把焦點放在殖民統治「破壞性的衝擊」，強調殖民政府不恤民瘼並侵擾百姓的缺點，往往掩蓋了意圖與結果之間，以及預期與表現之間的差距。如托馬斯所言：「如果認為有某種源自宗主國的一元化表述，可以加之於被動的空間，

27. Arif Dirlik,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 of Orientalism," *History and Theory* 35.4 (December 1995): 96–120; MacKenzie, *Orientalism*, p. 11; Sarkar, "Orientalism Revisited," p. 242.

28. 關於「殖民統治的『含糊不清』」，見 Jürgen Osterhammel, *Colonialism: A Theoretical Overview*, trans. Shelley L. Frisch (Princeton: Markus Wiener, 1997), p. 4；Nicholas Thomas, *Colonialism's Culture: Anthropology, Travel and Govern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7。

而在過程中不受各種觀念或交會接觸所影響左右，那就無法理解殖民統治的動態變化。」[29]

香港殖民統治所賴以為基礎的，既有「他者性」和差異，也有相似和類近之處。雖然華人和歐籍人彼此並不親近，但雙方領袖很快學會如何在一些共同關注的問題上合作。例如，1848年2月，逾二十名華商與一群歐籍貿易商攜手抗議地租。[30] 華商、英商和殖民地官員全都渴望擴大香港和中國的資本主義。所有人都同意，十九世紀末的中國病入膏肓，而治療良方是商業和政治自由主義。所有人都關注香港乃至中國（尤其辛亥革命後民國初年政局動盪的華南）的太平安定。雖然華人和英國人各自有專屬的社交會所和協會，令彼此老死不相往來，但這些組織仍是一種互相理解的顯示社會地位的方式。

香港華人資產階級

在本書中，「資產階級」一詞的意義很寬泛。研究上海資產階級的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ère）寫了一本關於中國資產階級黃金時代的著作，現已成為經典，本書沿用她使用這個詞時的意涵，是指「與現代商業有關的城市精英」，[31] 包括企業家、買辦、銀行家、工業家，以及諸如律師和醫生等專業人士，亦即十九世紀末新興商業階級各成員，孕育他們的是香港的商業發展，以及對華貿易和國際貿易。「資產階級」既指變化過程，也指一種變動不居的類別，當中沒有法律上的界限。成為資產階級一員除了關乎經濟地位，也牽涉到自我意識和自我感覺、社會制度和公共事務的參與。因此，本書對資產階級的商業網絡著墨較少，而多集中於「資產階級化」（embourgeoisement）這個涉及多方面的過程：在殖民地環境中創造正直的公民身份；致力促進香港的社會、文化和經濟發展，尤其是靠成立各種志願組織來達成；以及肩負維持香港安定太平的責任。

29. 有關殖民地內的對話，如見收錄於以下著作的文章：Stuart B. Schwartz, ed., *Implicit Understandings: Observing, Reporting, and Reflecting on the Encounters between Europeans and Other Peoples in the Early Modern Er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關於「創痛的關係」，見 Loomba, *Colonialism/Postcolonialism*, p. 2；關於「一元化表述」，則見 Thomas, *Colonialism's Culture*, p. 60。
30. Great Britain, Colonial Office,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Hong Kong, 1841–1951, Series 129 (CO 129), Public Record Office, London, CO 129/23, February 26, 1848, "Memorial from the European and Chinese Inhabitants in Hong Kong relative to the Payment of Ground Rents," pp. 222–226.
31. Bergère, *Golden Age*, p. 191.

香港華人資產階級擁有共同的資產階級文化和身份。如同歐洲資產階級，香港資產階級「這個社會階層，是因相同價值觀、共同文化，以及由房地產和薪金帶來的富裕而凝聚在一起」。[32] 香港資產階級領袖宣稱他們代表身處的殖民地的利益。他們自知自己對香港和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並且確實為此感到很自豪。他們很注重自己與什麼樣的人過從，關切自己的職業和社交生活，並很留意社會上其他人對他們的印象。一如其他地方的情況，香港資產階級認為自己不同於其他階級，並因這種自命不凡的強烈感覺而團結在一起。在香港，這個資產階級認為自己迥異於眾多「他者」，包括中國大陸的華人資產階級、本地歐籍資產階級，以及香港的低下階層華人。

香港主權最近回歸中國，令這研究具有歷史和當代意義。除了有助我們更深入了解一個在香港史、中國史和英國殖民史上十分關鍵的時期，它也質疑關於中國民族主義和所謂中國特質的標準假設，而這兩者都與這個在中國「本土」以外的華人城市的殖民地性質密不可分。人們也常有一種假設，認為受殖民統治的民族必然會受民族主義激發而起來反抗殖民者，本書也質疑這種假設。事實上，香港華人資產階級懷有建立富強的現代中國的渴望，不但沒有令他們和殖民地政府變得枘鑿冰炭，反而使兩者聯合起來。華人資產階級領袖和政府都相信，有利於中國的事，也能裨益於香港（不過在1920年代，對於邊界彼方的主要政治勢力所認為有利於中國的事，他們頗不以為然）。此書或有助解釋為什麼在殖民地時代香港，政府與社會關係的融洽程度，令中華民國（不論是1949年前在中國還是之後在台灣）瞠乎其後，遑論中華人民共和國了。

本書取名《帝國夾縫中的香港》，是考慮到中華帝國和大英帝國之間的異同。雖然歷史學家通常不願承認中國是實行殖民擴張的國家，但近期的幾項研究揭示清代中國（1644至1911年）與近代初期的歐洲帝國有許多相似之處。何羅娜（Laura Hostetler）指出，和帝制時代的法國和俄國一樣，清廷在清朝初年利用地圖學和民族誌描述來擴張帝國，而它的墾拓者驅逐原住民，藉此在帝國版圖內的幾處地方實行殖民。[33] 米華健（James Millward）認為，即使十九世紀的中國受害於歐洲帝國主義，但清廷也是實行擴張的帝國，今天中

32. David Blackbourn and Richard J. Evans, eds., *The German Bourgeoisie: Essays 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German Middle Class from the Late Eighteenth to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1991), p. xiv.

33. Laura Hostetler,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國的疆域版圖就是當時奠定的。[34] 何偉亞（James Hevia）則指出大清帝國和大英帝國的帝國論述之間的相似。[35] 他認為清帝國和這個歐洲帝國的差異，不在於「組織和治理帝國的手法」，而在於「軍事和商業技術」。[36] 不過，正因為中國和英國並非同一類帝國，才令香港這個地方有了後來的際遇：十八世紀末英國人來到這裡時，他們所代表的是一個版圖日大的帝國，而此時的大清帝國已經西山日薄。

34. James A.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35. James L. Hevia,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Mission of 1793*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6.
36. James L. Hevia, *English Lessons: 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66.

第五章

民族主義與身份認同：何啟的例子

香港進入二十世紀，新的華裔商人和專業人士階級亦隨之崛起。這個階級的領袖不少是生於香港，在此地受教育，再到英國深造，他們自視為得天獨厚的一群，不獨在香港如此，在大中華世界和大英帝國亦復如是。然而，他們和許多海內外華人一樣，愈來愈關注祖國的命運。中國經過十九世紀末連串與西方列強爆發的衝突後——以 1894 至 1895 年甲午戰爭慘敗於日本為極點，已證明無力抗禦外國帝國主義者，只能任人魚肉。

何啟是這個香港華人新階級的一員，他是大律師、金融投資家、醫生，並且是社會領袖。何啟支持中國革命運動，卻同時相信西方勢力的存在有利於中國；他又為香港殖民地政府效力，因此常被人形容為「與外國強權協力的愛國者」，不得不在香港與中國之間二選其一。但是，何啟似乎不同意這種非此即彼的二分法。何啟的中國民族主義思想是在殖民地環境中孕育，在他眼中，有利於香港的事物，對中國也必有裨益。要令中國強大，關鍵在於令中國商業興旺。這種信念是源自何啟對於殖民地香港的認同。

歷史天平上的何啟

何啟不如其他中國民族主義者那麼為人熟知，但十九世紀下半葉，香港和中國通商口岸有一批人數不多但十分重要的改革家，何啟是其中一員。一項有關晚清政治改革家的研究，把何啟對洋務運動（1861–1895）的撻伐形容為「這個改革運動中具有象徵意義的轉捩點」。事實上，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的許多政治意念，「至少部分是源於他在早年歲月熟知何啟的人民主權思想」。有些學者強調何啟政治思想的激進本質。雖然何啟與立憲派的康有為和

激發省港大罷工的五卅運動，標誌著英帝國主義在華勢力開始步向終結。[64] 但是，1920年代中國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的革命工作目標，迫使香港的殖民政治策略出現重要變化，周壽臣獲任命為議政局議員就是明證。從殖民地政府與華人資產階級領袖之間關係的角度看，後者在大罷工期間對政府的支持，是幾十年與外來政權合謀協作的顛峰。但是，這些華人領袖並非僅僅支持政府，而是發揮很積極主動的作用——協助政府與廣州當局談判，為政府提供意見，協助宣傳活動，並把這場罷工渲染為針對香港的布爾什維克陰謀，在此殖民地內不得民心。對資產階級領袖來說，打擊這場罷工，是為保全這個曾是傳說中的荒島、後經他們參與建設經營而有今天的殖民地，並維護他們共同塑造的新生活方式。同時，這些人利用這場大罷工向港府顯示自己是它的盟友，向它表示忠誠，並證明自己是香港華人。殖民地政府把香港華人視為來自廣州的渣滓的舊觀念已不再適用，就像香港是荒島的形象已不合時宜一樣。

64. Robert Bickers, *Britain in China: Community, Culture and Colonialism, 1900–1949*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3–4.

第七章

滄海桑田：1941開埠百周年

1941年是香港開埠（即成為英國殖民地）一百年慶典，但這是很難令人有心情慶祝的一年。因為中國的主要城市已被日軍攻佔，英國又正與德國鏖戰，英、日之間的戰爭也迫在眉睫。由於1937年中國與日本開戰，大批中國難民湧入香港，單在1938年就來了五十多萬人，令原本已擁擠的居住環境更形惡劣。歐亞混血兒羅旭龢是代表華人的行政局非官守議員，他和其他人深知這種黯淡情況：香港已沒有閒情逸致慶祝或盡歡，尤其「半個世界正受炮火和炸彈蹂躪，另一半則在利劍的陰影籠罩下忐忑惶恐」。[1]

相較於1891年紀念香港開埠五十周年的金禧慶典，1941年的慶典規模大大縮減，幾乎沒有任何慶祝活動。像樣的金禧慶典應有的內容，1891年的慶典通通不缺：船舶張燈結綵，聖公會和天主教教堂舉行禮拜，維多利亞港的戰艦鳴放禮炮致敬，快活谷跑馬場舉行閱兵儀式，還有運動比賽，大會堂更舉辦公眾舞會，還有木球比賽和射擊比賽，慶祝活動的高潮是在德國會所舉行的音樂會。歷史悠久的大公司屈臣氏，剛巧也慶祝在香港成立五十周年，所以自行舉行表演活動。據《孖剌西報》報導，因為有「一大群華人聚集在一起欣賞盛況」，皇后大道有多個鐘頭擠得水洩不通，路為之塞。然而，1941年的百周年慶典，則僅限於幾份報章出版了增刊和紀念特刊。以英文出版的《香港開埠百年紀念講話錄》（*Hong Kong Centenary Commemorative Talks*）是電台演講輯錄，本地中文出版社則出版了《百年商業》。《香港百年史》原本打

1. Robert Kotewall, "Anglo-Chinese Co-operation—Past, Present & Future," in *Hong Kong Centenary Commemorative Talks, 1841–1941* (Hong Kong: World News Service, 1941), p. 30.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China Mail, *Hong Kong Centenary Number*, January 20, 1941, pp. 2–18.

算在1941年出版，後來內容有所修訂，以涵蓋二次大戰的日佔時期，並延至1948年才付梓。這三本特刊全都描述香港在短短一百年之間，從「荒島」或「不毛之地」奇跡似的蛻變為繁華都市。[2]

本書之前各章顯示，香港的殖民統治如何留下了空間，令上層華人得以施展。本章探討這些人如何利用**歷史**來凸顯自己的香港華人身份。雖然周年紀念通常會有的那些精心策劃的儀式，1941年香港開埠百年紀念一概付諸闕如，但它也不只是回顧過去的方式。[3]它還嘗試闡明以下幾點：建立在香港經濟成就之上的集體身份認同，香港在大英帝國之中的位置，以及香港為建設現代中國所起的作用——而這些全是華人、英國人和其他群體在這一百年通力合作的成果。香港華人也趁著開埠百年紀念這個時機，挪用殖民當局的官方版香港史論述來凸顯自己的身份。他們把香港「真正」歷史的起源，追溯至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的1841年，從而將香港的歷史發展，放到一條與他們密不可分的軌跡上。他們強調香港的商業發展，以此強調自己在這過程中的作用。他們把香港的發展與進步跟中國大陸相對比，從而強調自己的獨特性。此外，殖民歷史忽視華人對於香港歷史發展和經濟成就的貢獻，開埠百年紀念是挑戰這種歷史的手段。

一個百年紀念，眾多行動者和目標

1941年的香港和1891年時迥然不同。現在，這個殖民地處於英國、中國和日本這三個帝國的邊緣，風雨飄搖。台灣在1895年成為日本殖民地後，拿著日本護照的台灣華商加入本地華人商界，而從1930年代初起，日本商人就對香港經濟產生了巨大影響力。但1941年，日本政府勸喻在港日僑如無要事，最好盡早離港回國，這是不祥之兆。[4]

---

2. "The Jubilee Celebrations," in Hong Kong Daily Press, *Fifty Years of Progress: The Jubilee of Hongkong as a British Crown Colony, Being an Historical Sketch to Which Is Added an Account of the Celebrations of 21st to 24th January, 1891* (Hong Kong: Hong Kong Daily Press, 1891), pp. 32–42; *China Mail*, January 10–26, 1891。關於「一大群華人」，見 "Jubilee Celebrations," p. 41。關於「1941年百周年紀念」，見陳大同編：《百年商業》（香港：光明文化事業公司，1941）；黎晉偉主編：《香港百年史》（香港：南中編譯出版社，1948）。
3. 關於「紀念活動」，見 John Bodnar, *Remaking America: Public Memory, Commemoration, and Patriot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John R. Gillis, ed., *Commemoration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Ident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及 William M. Johnston, *Celebrations: The Cult of Anniversarie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1991)。
4. 關禮雄：《日佔時期的香港》（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3），頁9–10、11。

> 責吾人之未能盡此應盡之責任也。因此吾人對於香港、英國、中國所應負之責任，察其仍未完全做妥者尤須努力完成之。[48]

羅旭龢的呼籲，令幾乎所有這些文章一個共有的主題更顯得刻不容緩，這個主題就是：香港的過去仰賴於英中合作，未來亦復如是。

香港華人與香港成功之道

開埠百年紀念的主要目標之一，是顯示香港的集體記憶和身份認同。幾十年來，殖民地官員一直強調須培養華人的「殖民地感情」(見第五章)。但是，紀念活動不只是由上而下創造集體記憶的工作，因為連一些與殖民地政府沒有瓜葛的華人也參與其中。百年紀念的時機，也不只是用來頌讚殖民地政府，或香港賴以建設的英中合作。有些本地居民利用百年紀念揄揚此殖民地的過去，同時提醒人們注意它的問題。羅旭龢在《百年紀念講話錄》中慨歎：「應以改善平民生活為前提，安定其歸宿為先著，凡地方上窳陋屋宇，既應拆毀，重建一種適合衛生原則，便於貧民負擔住宅。」著名華商李佐臣細數香港商業蓬勃之同時所出現的問題：物價高漲、盜劫案增加、貧民生活困促和自殺等。[49] 羅文錦警告，對於過去香港的成就不應太自滿：「吾人對於一切污點之得勢，人民之困乏，貧民窟之充塞，公共事業之缺乏，如醫院衛生設備，工人之補恤，實業燕梳等，能否認為滿意耶？」[50]

百年紀念也是批評殖民地政府的時機。羅文錦就趁機隱晦地責備殖民地政府在動盪時期實行審查。他說，過去一百年香港最令人矚目的特點，是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他提醒聽眾，自由和消息可靠的新聞界，有助於塑造輿論和培養公共意識。[51] 不過，這看似溢美的讚揚，是來自對港府批評最力之人，唯一曾抗議港府行政權力過大的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在1920年本地一場罷工中，羅文錦為機器工人的工會擔任顧問。在百周年紀念前不久，他曾促請政府撤銷對華文報章的審查，但不成功。1939年6月，羅文錦批評電訊交通則例修正案，此修正案賦予郵務司權力，令他可授權轄下人員進行搜查和逮捕。[52]

---

48. Ibid., p. 30.
49. Kotewall, “Anglo-Chinese Co-operation,” p. 48；關於「李佐臣」，見〈各界名流〉，頁21。
50. “Centenary Messages,” p. 31；〈各界名流〉，頁21。
51. Ibid.
52. 陳大同等編：《香港華僑團體總覽》(香港：國際出版社，1947)，頁數不詳；Norman J. Miners, *Hong Kong under Imperial Rule, 1912–1941*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63；吳醒濂：《香港華人名人史略》(香港：五洲出版社，1937)，頁13。

結 論

香港時間1941年12月8日，日本轟炸機空襲香港、馬來亞、珍珠港和菲律賓。日軍南下越過新界，長驅直進九龍，又散發傳單呼籲此殖民地的華人和印度人起義，驅逐英國主子。英軍的大炮和彈藥既老舊，數量又不足，防衛方案拙劣，情報一直不準確，防線迅速崩潰。日軍向港島發動三路攻勢後一周，港督楊慕琦（Mark Young）於聖誕日向日軍司令酒井隆中將無條件投降。到了1942年2月，新加坡也淪陷（那天香港宣佈放假慶祝，舉行舞獅、巡遊，並額外增加白米配給量），此時大英帝國在遠東的版圖已經日薄西山。[1]

三年零八個月的「香港佔領地」歲月於焉開始，儘管日本人宣稱香港從此加入「大東亞共榮圈」，但其實不過是被日本殖民統治。一如這個新帝國其他領土的情況，日本人很快在香港露出猙獰面目，他們遠比歷來統治此地的英國人都要殘暴。有組織的強姦、傷害和處決，加上缺糧和強迫戰前幾年由中國來到此地的難民歸鄉，令香港人口由原來的逾一百五十萬銳減至約五十萬。惡名昭彰的日軍憲兵隊恣意妄為，創造出「任何其他日佔地區憲兵隊都瞠乎其後的帝國」。[2]

---

1. 此處關於香港日佔時期的簡述，資料取自：G. B. Endacott, *Hong Kong Eclipse*, ed. Alan Birch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高添強、唐卓敏編著：《香港日佔時期》（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5）；關禮雄：《日佔時期的香港》（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3）；Henry J. Lethbridge, "Hong Kong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Changes in Social Structure," in *Hong Kong: Society in Transition*, ed. I. C. Jarvie and Joseph Agassi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9), pp. 77–127；以及 Philip Snow, *The Fall of Hong Kong: Britain, China, and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 Snow, *Fall of Hong Kong*, p. 161.

新統治者也試圖盡快抹去香港的英國色彩，拆除英國皇室人員和殖民地官員的雕像，街名和地名改為日式名稱（如皇后大道改稱明治通）。連在快活谷比賽的馬都取了日本名。日本人又廢除公曆，改用當時日本天皇年號（昭和），並引入日本節日，如紀念日本戰歿者的靖國神社春祭，紀念神武天皇登位的紀元節，紀念天皇壽辰的天長節——不過他們仍然准許華人慶祝紀念辛亥革命的雙十節，藉以顯示他們是反英而非反華。

日本人為鞏固統治，拉攏曾與英國人合作的本地社會領袖，成立兩個由重要華人和歐亞混血商人組成的代表機構，負責宣傳政策和管治華人。華民代表會主席為羅旭龢，成員有交通銀行經理兼華商銀行公會主席劉鐵誠，東亞銀行經理兼前立法局非官守議員李子方，以及曾任滙豐銀行廣州分行買辦的陳廉伯。華民各界協議會則有二十二名委員，由華民代表會從各專業精英中選出，該會主席是周壽臣，成員包括羅文錦和葉蘭泉。

這些華人和歐亞混血兒為何甘願與日本人合作？他們是否因為能夠攆走英國主子，與同是亞洲人的日本人合作而感到欣喜？1942年1月10日，酒井隆中將在九龍半島酒店設午宴，邀請約一百三十名華人和歐亞混血兒頭臉人物赴會，羅旭龢和周壽臣是主賓。羅旭龢首先感謝日本人沒有「傷害香港人，也沒破壞這個城市」，並宣稱因為日本人是以「解放東亞各民族」為目標，他和其他領袖會與日本人合作，他祝願天皇「萬歲」；周壽臣「衷心」同意。羅旭龢、周壽臣和李子方全都表示期盼中日戰事早日結束，羅旭龢形容這場戰爭「猶如兄弟間的爭吵，只是一時的衝突」。[3]

有些華人相信日本「亞洲人的亞洲」的宣傳，真心誠意與日本人合作。據萊思布里奇說，香港留日同學會會長劉鐵誠「早年在日本留學時被徹底洗腦」，所以「非常親日」。[4] 1945年4月劉鐵誠去世，總督也出席喪禮致哀。日本攻打香港期間，陳廉伯曾因通敵罪名被英國人逮捕。1944年他坐船前往日本途中，被美國轟炸機炸死。其他人或許各自對英國人心懷不滿：和藹可親的買辦兼慈善家何甘棠，現在當上賽馬會（當時稱為香港競馬會）首名華人主席，據說他在英治時期被禁止加入賽馬會董事局，所以他矢言現在絕不會讓英國人入會。

儘管日佔時期香港人的生活痛苦不堪，但我們也切記不應只把日本佔領描繪為悲慘的鬧劇，而不去思考它為華人合作者帶來了什麼。孫福林（Philip Snow）認為，日本人令更多華人能參與「這個殖民地的中央行政機關，這是

3. Ibid., pp. 107–108, 116.
4. Lethbridge, “Japanese Occupation,” pp. 110–111.

過去英國人所難以企及的」。[5] 日本把工作下放的做法，賦予華人在英治時期不曾有過的更大職權，而日本人建立的區役所網絡，也是英治時期未有之舉。日本人不同於英國人，他們會做很多工夫向華人宣傳和解釋政策。日本人在公共衛生、教育和農業方面也有建樹。他們對於保持公共衛生有著「幾乎狂熱的執著」，令天花和霍亂的發病率大大低於戰前。[6]

大部分華人和歐亞混血兒領袖之所以與日本人合作，大概是懷著與大多數香港市民一樣的心情，「既不甘願又惶恐不安，但為求自保而不得不為之」。[7] 沒有人知道戰局何時逆轉，尤其是日本人在中國節節勝利，初期在東南亞也連戰皆捷。恐懼與實事求是無疑是與敵合作的重要原因，另一個原因是為保存自己的階級利益。許多人與日本人合作是為幫助本地社群。包括前代督岳桐在內的幾名殖民地官員，在戰後作證說，他們曾要求周壽臣和羅旭龢與日本人合作，以保障華人利益。[8] 最後，也有一些英國人與日本人聯手，例如與其他英國人一同囚禁在香港島南面赤柱的高級銀行家，他們本來可以拒絕與敵合作，但為了保持金融穩定而協助日本人。前醫務總監司徒永覺（P. S. Selwyn-Clarke）也跟日本人合作，以保護華人、被囚歐籍人和戰俘。無論在日佔時期和戰後，華人對兩華會沒有太大恨意，顯示大部分華人明白華裔和歐亞混血裔的社會領袖與敵合作是迫不得已的。

華人和歐亞混血領袖（陳廉伯和劉鐵誠是例外）與日本人合作時，也不像以前與英國人合作時那麼積極。到了1943年中，香港許多人知道日本人敗象已呈。到了那個時候，「日本殖民統治在許多方面都明顯比英國人更暴虐、更官僚和更腐敗，而且更不講理性和沒效率。」[9] 1943年聖誕日，羅旭龢發表電台講話，紀念日本佔領香港兩周年。儘管他讚揚香港在總督磯谷廉介將軍治下取得的進步，但口吻完全不像1941年香港開埠百年時那麼熱情洋溢。他不是把1942年的情況，與英治時期作對比，而是與日本攻佔香港後最初幾個星期的兵荒馬亂相比較。[10] 到了1944年，本地領袖開始不履行兩華會職責，羅旭龢和李子方以健康為由辭任公職。

1943年末英國官員開始計劃在戰後收復香港，該如何處置那些舊有的商界和專業精英，成為須要處理的問題。英國人需要本地人支持的基礎，但有

5. Snow, *Fall of Hong Kong*, p. 130.
6. Ibid., pp. 164–165.
7. Endacott, *Hong Kong Eclipse*, p. 238.
8. 岳桐關於會見周壽臣和羅旭龢的記述，見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ctober 2, 1945。
9. Lethbridge, “Japanese Occupation,” p. 99.
10. Snow, *Fall of Hong Kong*, p. 171.